

## 第一章

我为什么回到这个村镇，这里，而不是回到卡奈利、巴尔巴莱斯科或阿尔巴，有一个理由。我不是生在这里，这几乎是肯定的；我生在哪里，我不知道；在这些地方没有一栋房屋，没有一块土，没有一些骨头<sup>①</sup>，我可以说“这是我出生前的样子”。我不知道我是来自丘陵还是来自谷地，来自森林还是来自一幢有阳台的房子。将我留在阿尔巴的大教堂的台阶上的那

---

<sup>①</sup> 此处的骨头代指祖先的遗骸。

个女孩，也许也不是从农村来的，也许是一座宫殿的主人的女儿，或许是两个穷妇人将我装在采葡萄用的篮子里带到那里的，她们来自蒙提切罗，来自奈伊维，或者为什么不是来自克拉万扎纳？谁能说出我是由什么肉做成的？我走遍了世界，足以知道所有的肉都是好的和彼此相同的，但正是由于这样，一个人疲倦了，于是努力扎下根，为自己创造土地和家乡，以便使他的肉有价值，并忍受某个比季节的一次普通转换更多的东西。

如果说我在这个村镇里长大，我必须要感谢维尔吉利亚，感谢教父<sup>①</sup>，所有这些已经不在的人，虽然他们抱了我并养大我，只是因为亚历山德里亚的医院付给他们每个月的费用。在这些山丘上，四十年前，有些被罚下地狱的人，他们为了要看见一块银斯古多，就在他们已经有的子女之外，使自己负担起医院的一个私生子<sup>②</sup>。有人领养一个女孩，为的是以后使自己有个用人并且能更好地使唤她；维尔吉利亚想要我是因为她已经有了两个女儿，而当我长大了一些时，他们希望能够进入一座大农场大家一起劳动并且过得好。教父当时有加

---

① 主人公鳗鱼把对养父的称呼 *padrino*（教父，代父）当成他的名字了。

② 本书写于一九四九年，所以，四十年前指的是二十世纪最初的那十年时间。被罚下地狱的人，这里指极穷苦的人，他们就像被上帝罚下了地狱一样根本看不到希望。斯古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意大利流通的一种银币，值五里拉。

米奈拉的小房子——两个房间和一个牛圈，山羊和长着榛子树的河岸。我和女孩们一起长大，我们相互抢玉米糊，我们睡在同一张床垫上。大女儿安乔利娜比我大一岁；只是在十岁时，冬天里，维尔吉利亚去世时，我才偶然知道我不是安乔利娜的弟弟。从那个冬天开始，懂事的安乔利娜就不得不放弃和我们一起在河岸上和树林里转；她操持着家，做面包和奶酪，她去市政府取我的那个斯古多；我对朱利亚吹嘘说自己值五个里拉，对她说她结不出任何东西来，并且问教父为什么我们不再领一些私生子来。

这个时候我知道我们是些穷人，因为只有穷人才养医院的私生子。在这之前，我上学的时候，别的孩子说我是私生子，我以为这是个和胆小鬼或流浪汉一样的名字，就立即也这样回答他们。但我已经是个长大的男孩，市政府不再付给我们那个斯古多了，而我还没有很好地明白，不是教父和维尔吉利亚的儿子就意味着我不是生在加米奈拉，不是像女孩们一样从榛子树林下或从我们的山羊的耳朵里钻出来的。

前年，当我第一次回村里时，我几乎是偷偷地来重新看看榛树林。加米奈拉的山丘，一道由葡萄园和河岸构成的长长的不中断的山坡，一道抬起头来看不到顶的难以感觉到倾斜的斜坡，就像是被冬天剥了皮，展示出土地和树干的裸体画。

而在坡的顶上，谁知道什么地方，又有别的葡萄园、别的树林、别的小道。我在干燥的光亮中清楚地看到，巨大的山丘向着我们的山谷最终到达的卡奈利降下来。我沿着贝尔波河边的小路，到达小桥那里的葡萄架，到达芦竹丛。看到在路边的窄田上那用被熏黑的大石块砌的小房子<sup>①</sup>的墙，歪斜的无花果树，空空的小窗户，我想到那些可怕的冬天。但是在周围，树木和土地都有了变化；茂密的榛树林消失了，变成一片高粱的残株。从牛圈里传出一声公牛的叫，在夜晚的寒冷中我感觉到一种牲畜粪便的气味。此刻在小房子里的人不再是如同我们这样的乞丐了。我一直指望着见到某种类似的东西，或者说是希望小房子已经垮掉；有许多次我在桥的栏杆上想象着问自己，怎么可能在那洞穴里，在这不多的几条小路上，放着羊，寻找着滚到河岸边的苹果，坚信世界就在道路俯临贝尔波河的那个拐弯处结束，就这样度过了这么多年？但我没有预料到会再也找不到榛树林。这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这一新奇事使我沮丧得不喊叫，也不进打谷场。我渐渐地明白，不生在一个地点，不在自己的血液中拥有它，不与老人们一起已经被半埋在这里，意味着什么，而一种耕作的改变并不重要。当然，还有一些榛树林留在那些山丘上，我还能在那里重新找到我自己；如果我是那河岸的主人，也许我自己会把

---

① 也就是教父家当年的那小房子。

它细细耕耘并种上庄稼，但在当时，河岸对我起到的是城市里那些房间的作用，在城市里人们租借房子，在那里生活一天或几年，然后当搬家后，房间仍然是空的、可支配的、死的壳子。

幸好那天晚上当我将背转向加米奈拉时，我面对着贝尔波河那边的萨尔托山丘，它的各个小山顶，那些一直到山顶才消失的大草地。而在更下的地方，也是遍布着被河岸分割成小块的贫瘠的葡萄园，树林、小路、分散的农场就和我曾经坐在小房子后面的梁上或是在桥栏杆上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看到的一样。后来，在我为位于贝尔波河那边的肥沃平原上的莫拉农场做仆人，而教父在卖掉了加米奈拉的小房子后带着女儿们去了科萨诺<sup>①</sup>的所有那些年，一直到征兵，在所有那些年里，只要我从田地里抬起眼睛，就看到天空下的萨尔托的葡萄园。这些葡萄园也朝着卡奈利，朝着铁路的方向，朝着从晚到早沿着贝尔波河奔跑，使我想到奇迹，想到车站和城市的火车的汽笛方向降落下来。

就是这样，这个我并不出生于此的村镇，我在很长时间里一直相信它就是整个的世界。现在，在我已经真正地看过了世界，并且知道世界是由许许多多的小村镇构成的之后，

---

<sup>①</sup> 村镇，在卡奈利西南约八公里。

我不知道是不是从童年时我就弄错了，然后错得更多。在海上和陆地上转一圈，也像我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去到周围村镇的集市上，跳舞，喝酒，斗殴，把旗子和打破的拳头带回家。采了葡萄，把它拿到卡奈利去卖；蘑菇收集了，被送到阿尔巴。这里有我在萨尔托的朋友努托，他供应整个山谷直到卡莫<sup>①</sup>的大木桶和葡萄压榨机。这意味着什么？需要一个家乡，即使只是为了那种想要离开它的爱好。一个家乡意味着你不是单独的，意味着你知道在人群中，在树林里，在土地里，有某种你自己的东西，这东西就是当你不在这里时，也一直在等待着你。但是安心地住在这里是不容易的。我紧紧地盯着有一年时间，当可能时，我逃离了热那亚，我逃脱了。这些东西要靠时间和经历才能被理解。怎么可能到四十岁，等看过了整个世界后，还不知道我的村庄是什么？

有某种东西令我不能相信。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回来是为了给自己买一幢房子，他们喊我美国人，让我看他们的女儿。对于一个在离开时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的人来说，我应该感到高兴，确实我感到高兴。但是还不够。我还喜欢热那亚，我喜欢知道世界是圆的，喜欢一只脚放在舷梯上。从我还是个孩子，在莫拉的栅栏边，倚着铁铲，听着大路上经过的游手好闲者们的闲谈那时起，对于我来说，卡奈利的

---

① 村镇，在卡奈利西南偏西约八公里。

小山丘就是世界的大门。与我相比，努托从来没有远离过萨尔托，他说想要做到生活在这山谷里，根本不需要走出去。正是他还是个小伙子时，就已经能够在比卡奈利更远处的乐队里吹低音单簧管，一直到斯皮尼奥，到奥瓦达<sup>①</sup>，在太阳升起的那地方。我们不时地谈论这些，他笑了。

---

<sup>①</sup> 斯皮尼奥，村镇，在卡奈利南约十五公里。奥瓦达，村镇，在卡奈利东南偏东约二十五公里。

## 第二章

这个夏天我在天使旅馆住下，在镇里的广场上。在镇子里不再有人认得我，因为我又高又大。我在镇子里也不认得任何人；我小的时候，人们不常来镇子里，他们在大路上，沿着街道，在打谷场上生活。镇子在谷地的高处，贝尔波河的河水在我的那些山丘下变得宽阔起来之前半小时，在教堂前流过。

我来是为了休息半个月，恰好是在八月的圣母节<sup>①</sup>。那更好，外地人的来去，广场的混乱和

---

① 也就是圣母升天节，在八月十五日。



嘈杂，这一切甚至都能把一个黑人掩藏起来。我听到人们喊叫，唱歌，踢球；天黑时，是焰火和鞭炮；人们喝了酒，狂笑了，游行了；在广场上连续三个夜晚，整夜都是跳舞，响着汽车声、短号声、气枪的爆炸声。和以前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酒，一样的脸。在人们的大腿之间奔跑的小男孩是以前的那些小男孩；大围巾，一对对的公牛，香水，汗水，女人穿在黑色大腿上的袜子，还是以前的那些。还有在贝尔波河岸的那些欢乐，那些悲剧，那些许诺。在从前，手里拿着第一个月的工资四个索尔多<sup>①</sup>，我冲进集市，冲到射击场，冲到秋千上，我们使那些扎着辫子的女孩哭泣，我们中没有一个知道为什么男人和女人、油头粉面的小伙子和高傲的女孩会相互见面，相互喜爱，面对面地笑，并且在一起跳舞。在现在，我知道了这些，而那个时间已经过去了。我离开谷地时，刚刚开始知道这些。留在这里的努托，萨尔托的木匠努托，我最初逃到卡奈利的同谋，后来十年里，在谷地所有的节庆、所有的舞会上吹单簧管。对于他来说，世界是一场持续十年时间的节庆，他知道各个村镇所有的醉鬼、所有的卖艺者和所有的欢乐。

一年以来，每次我逃跑，都去找他。他的家在萨尔托的

---

<sup>①</sup> 辅币名，值二十分之一里拉，这里的四个索尔多是说不多的几个小钱。本书中的数字“四”基本上不是确切的数字，而是“很少几个”、“不多的几个”的意思，如后文中的四根芦竹、四抃土地、四个蘑菇、四块骨头等。

半山腰，面对空旷的林荫道，有一股新鲜木头、花和刨花的气味。在莫拉的最初那些年里，对于来自一间小房子和一块打谷场的我来说，这气味就像是另一个世界：这是大路的，歌唱艺人的，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卡奈利的那些别墅的气味。

现在努托已经结了婚，是个成熟的男人，劳动并且给别人事情干。他的家仍旧是过去那个房子，在太阳下发出天竺葵和苏铁的气味，窗子上和房屋的前面就垂挂着这些植物。单簧管挂在橱柜上；人走在刨花上；他们整篮整篮地把刨花抛在萨尔托山下的河岸——一条长着金合欢、蕨类和接骨木，在夏天总是干燥的河岸。

努托对我说过他不得不做出决定——或者木匠，或者歌唱艺人——于是在过了十年的节庆之后，他在父亲死时放下了单簧管。当我告诉他我去了哪里时，他说他已经从热那亚的人们那里知道了一些事情，并且告诉我在村子里人们曾经讲述说我离开之前在桥墩下发现了一只金座钟。我们开起了玩笑。“也许现在，”我说，“连我父亲都要跳出来了<sup>①</sup>。”

“你父亲，”他对我说，“你就是。”

“在美国，”我说，“有一个好处，就是所有的人都是私生子。”

“这也是，”努托说，“一件需要改变的事。为什么必须有

---

① 意思是人们甚至会说他是什么有地位的人的儿子。

人是没有名字没有房屋的？我们不都是人吗？”

“随他去吧。我成功了，尽管没有名字。”

“你成功了，”努托说，“没有人敢再对你谈这个了；可是那些没有成功的人呢？你不知道多少不幸的人仍然在这些山丘上。当我带着音乐到处转时，几乎所有的地方，面对厨房，都能发现白痴、呆子和弱智。醉鬼的和无知女佣的孩子，人们使他们仅仅靠吃卷心菜菜帮和菜皮生活。还有人开他们的玩笑。你成功了，”努托说，“因为你以前好歹找到了一个家，你在教父家吃得不多，但你吃了。不是必须说，别的人正在成功，必须帮助他们。”

我喜欢和努托说话，现在我们是男人了，我们相互了解；但是之前，在莫拉的那个时候，在农场劳动的那个时候，比我大三岁的他已经会吹口哨和弹吉他了。他被人找，被人听；他和大人、和我们这些男孩子辩论，向女人们挤眼睛。我那时就已经跟在他后面，并且有时从田地里逃出来，为的就是和他一起跑到河岸上或跑进贝尔波河里，搜寻鸟巢。他告诉我怎么做才能在莫拉受尊重；后来在晚上他来到小院子里和我们一起监视农场。

现在他向我讲述他当歌唱艺人的生活。他曾经去过的那些村镇，就在我们周围。白天在太阳下明亮而多树，夜里是黑色天空中星星的窝。他和他那些星期六晚上在火车站的站

台棚子下教导的乐队同伴一起，轻松敏捷地来到集市上；然后，两三天的时间里，他们再也闭不上嘴巴和眼睛——单簧管去了是酒杯，酒杯去了是叉子，然后重新又是单簧管，短号，鼓；然后是另一场吃，然后是另一场喝和独奏曲，然后是午后点心，丰盛的晚宴，熬夜直到早晨。有聚会，游行，婚礼；有和对手乐队的比赛。第二天、第三天的早晨，他们从小包厢里直着眼睛走下来，把脸插到一桶水里，并且最好在大车、双轮马车和马厩牛圈之间倒在那些草地的草上，这是一种快乐。“谁付钱？”我问。“市政厅，一些家庭，野心勃勃的人，所有的人。而要吃饭，”他说，“总是同样的那些人。”

他们吃什么，应该听听。我回想起了他在莫拉讲述过的那些晚餐，别的村镇和别的时间的晚餐。但饭食总是同样的，听着讲述它们，我觉得又进入了莫拉的厨房，重新看到女人们在擦丝<sup>①</sup>，揉面，塞馅子，掀开锅盖和点火，那种味道回到我的口中，我听到折断茎秆的断裂声。

“你在这方面有激情。”我对他说，“为什么你放弃了？因为你父亲去世了？”

于是努托说，首先一件事，弹琴带回家的东西很少，然后，所有那些浪费和从来也不知道谁给钱，这些最终令人厌恶。“后来有了战争，”他说，“也许女孩们的腿还在痒，可是谁还会

---

① 即把土豆、南瓜之类用礞床擦成丝。

再让她们跳舞？在战争那些年里，人们喜欢的东西不同。”

“可是我喜欢音乐，”努托想了想继续说，“只有这事叫人烦恼。这真是一个坏主人……它变成一种罪恶，必须放弃。我父亲说罪恶比女人好……”

“行啊，”我对他说，“你和女人们怎么样？你曾经喜欢她们。跳舞时她们全都来这里。”

努托有一个边吹口哨边笑的习惯，尽管是严肃地这样做。

“你没有为亚历山德里亚的医院贡献什么？”

“我希望没有。”他说，“虽然有你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可是更多的人都是不幸的。”

然后他对我说，在两者之中<sup>①</sup>，他选择音乐。加入一个群体——这有时成功——夜里很晚回家，吹奏，吹奏，他，短号，还有曼陀林<sup>②</sup>，在黑暗中走在大街上，远离房屋，远离女人，也远离发狂一般回答的狗，就这样吹着。“小夜曲我从来不弹。”他说，“一个女孩，如果美丽，她寻找的不是音乐。她在朋友们面前寻找她的满足，她寻找男人。我从来不认识有哪个女孩明白演奏是什么东西……”

努托发现我在笑，立刻说：“我给你说一个女孩。过去有一个唱歌的人，阿尔波莱托，他吹中音号。他吹了那么多的

---

① 两者，指女人和音乐。

② 弦乐器，琴体呈半梨形。

小夜曲，以致我们说他：这两个人互相根本不说话，他们相互吹……”

这些话我们是在大道上说的，或是在他家的窗口一边喝着一杯酒时一边说的。在我们下方，有贝尔波的平原，为水流做出标志的树木。在巨大的加米奈拉山丘面前，全是葡萄园和河岸上的灌木丛。我有多少时间没有喝这种酒了？

“我已经对你说过了吧，”我对努托说，“科拉想要卖？”

“只是卖地？”他说，“你要当心他把床也卖给你。”

“麻袋的还是羽毛的<sup>①</sup>？”我咬着牙说，“我已经老了。”

“所有的羽毛都会变成麻袋<sup>②</sup>。”努托说。然后又对我说：“你已经到莫拉去看了一眼？”

事实是，我没有去。那里离萨尔托的房子只有两步远，而我没有去。我知道老头、女儿们、男孩们、仆人们，所有的人都分散了，消失了。有的死了，有的远离了，只剩下尼科莱托，那个曾经多少次踏着脚叫我私生子的傻瓜外甥，而一半的财物已经被卖掉了。

我说：“我有一天会去的。我已经回来了。”

---

① 这是问床垫是麻袋布的还是填塞羽毛的。

② 意思是说，即使填塞羽毛的床垫，时间一久，也会像麻袋布床垫一样又粗又硬。

### 第三章

在美国——多少年前？——我就有关于音乐家努托的新鲜消息。那时我还没有想要回来。那时，我离开铁路上的那帮人一站一站地到达加利福尼亚，看着太阳下那些长长的山丘，说：“我到家了。”美国也是在大海里结束的，而这一次不必再上船了，我就这样停在松树林和葡萄园之间。“看到我手里拿着锄头，”我说，“家里的那些人会笑的。”可是在加利福尼亚不用锄头挖地。这更像是做园丁。我在这里发现一些

皮埃蒙特人<sup>①</sup>，于是我厌烦了：穿过那样大的世界，就为看一些和我一样的人，并且他们还恶狠狠地看着我，这不值得。我在奥克兰种田并当送奶工。晚上，穿过海湾，可以看到圣弗朗西斯科<sup>②</sup>的街灯。我去了那里，受了一个月的饿，当我从监狱里出来时，我甚至都嫉妒那些中国人。这时我问自己，是不是值得为了看随便什么人而穿过世界。我回到山丘上。

我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并为自己弄了个女孩来，从她和我一起在小栎树街的小饭馆里劳动时起，我就不再喜欢她了。由于一再来门口接我，她使自己被聘为收款员，于是现在她整天通过柜台看着我，而我则在炸猪油和倒满杯子。晚上我出门，她用鞋跟跑在沥青路上赶上我，挽起我的手臂，希望我们叫停一辆小汽车，以便下到海里，以便去电影院。刚走出饭馆的灯光，人们单独地在星星之下，在蟋蟀和蟾蜍的一片嘈杂声中，我更想带她到那个农村，在苹果树下，小树林里，或者干脆就在悬崖上短短的草之间，使她倒在那地上，给予星星下的所有嘈杂声一个意义。她对这意义不感兴趣。她像女人们通常做的那样喊叫，要求进到另一个小饭馆里。为了让自己被人碰——我们在奥克兰的一个小巷里有一个房间——她希望自己是醉着的。

---

① 皮埃蒙特，意大利大区名，本书所涉及的布比奥、亚历山德里亚、阿尔巴等城市就在皮埃蒙特大区的亚历山德里亚省。

② 旧金山的音译名。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夜里我听到有人讲到努托。是从一个从布比奥<sup>①</sup>来的人那里。在他开口之前，我就从他的身高和步伐看出他是布比奥来的了。他拉着一卡车的木头，人们在外面给车加油时，他向我要一杯啤酒。

“也许一瓶更好。”我用方言说。

他的双眼笑了，看看我。我们说了一晚上的话，一直到外面不再有汽车喇叭声。诺拉从收款处伸长耳朵，晃来晃去，但诺拉从来没有在亚历山德利诺<sup>②</sup>住过，所以听不懂。我甚至给我的这位朋友倒了一杯被禁止的威士忌<sup>③</sup>。他告诉我说他在家就做过司机，那些村镇他都已经跑遍了，所以他来到了美国。

“可是如果我早知道人们就喝这东西……虽然能喝，可是并不好，加热，可是没有佐餐酒……”

“什么都没有，”我对他说，“就像月亮一样。”

诺拉生气了，梳理着头发，在椅子上乱动，打开收音机放跳舞的音乐。我的朋友耸耸肩，向柜台俯下身子，手指着背后：“你喜欢这些女人？”

我用破布擦着柜台。“是我们的错，”我说，“这个国家是她们的家。”

---

① 村镇，在卡奈利的南面。

② 处在亚历山德里亚省中心的一个地区。

③ 当时美国正实施禁酒令。